

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讲清楚三个问题

牟成文

(华中师范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为什么群众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过程中需不需要“批判”? 理论工作者怎样才能履行好自身的历史使命?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批判”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6) 02 - 0043 - 08

Three Questions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be Clearly Explaine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MOU Chengwe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ree problems. Why do people need to grasp the marxist theory? Does the Marxism need “the critique” in the process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How can theoretical workers carry out their historic mission? An in - depth study of these issue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arxism; popularization “critique”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否则,它们就会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的障碍,对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有的正面效果和影响。在笔者看来,当前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讲清楚:为什么群众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过程中需不需要“批判”? 理论工作者怎样才能履行好自身的历史使命?

一、为什么群众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什么群众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是一个常思常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楚,人民群众就会产生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否则,就会严重妨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尤其在当今形势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带给人们思想观念以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失灵论”、“边缘论”甚嚣尘上,对群众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些对讲清楚这个问题更是增加了难度。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结合新形势去向群众讲清楚这个问题呢? 在笔者看来,需要从群众的利益诉求同马

收稿日期: 2015 - 03 - 20

作者简介: 牟成文(1965 -),男,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政治发展道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等。

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有机关联性切入。

一般说来,群众需要的理论是能够解决群众问题的理论,是能够实现群众利益诉求的理论。用群众的话说,就是能够“管群众的事”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187)]目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可以归结为四个层面:物质利益,这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密切相关的利益;政治利益,这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利益;精神利益,这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密切相关的利益;社会利益,这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拓展密切相关的利益。其中,物质利益是基础,政治利益是保障,精神利益是指向,社会利益是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的利益之间存不存在有机关联性呢?笔者认为,是有的。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决定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群众的实践”改变现存世界以实现“群众的解放”的科学理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19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2](p284)]这种状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是具有广阔视野的理论,是能够抓住“群众”之根本利益的理论,是能够引领“群众”进行科学实践的理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具有广阔视野的理论。这能够从以下两方面得到体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运思上超越了传统理论的狭隘“眼界”,史无前例地把“群众的世界”作为自身理论的基本问题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实践理论思想上史无前例地把“改变世界”作为自身使命,从而变革了传统理论的“实践”的狭隘性和狭隘的“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都是以参加“群众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作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群众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深化、丰富、完善和发展,其解释力也因此变得更加充分而合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进入“群众的世界”又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大量的“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因此受到积极影响,从而提高了认识,克服了思想上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性,获得了思想的跃迁。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变“群众的精神世界”时也就变革了“群众的世界”。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能够抓住“群众”之“根本”的理论。这能够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史无前例地确认了“群众利益”在其理论中的合法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群众“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p79)]要知道,诸如吃、喝、住、穿等“世俗”的东西都是传统理论所不屑注目的事实材料。其中没有它们所要寻找的“真理”,它们必然不能成为传统理论的基底或入手处。因此,它们在传统的精神生产中必然没有任何合法地位。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世俗”的东西的认肯体现了他们对“群众的利益”之合法性的确认。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史无前例地把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解放视为己任。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围绕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的。“马克思哲学可以概括为‘人类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主要思想都可以概括在‘人类解放的哲学’这一名称之下”。^[4](p565)]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p267)]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铲除悲惨境域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最终铲除悲惨境域本身。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最为根本的路径、方式和手段。“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p303)]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又明确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再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能够引领“群众”进行科学实践的科学理论。这能够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

体现: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停止过对“群众”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性等落后性特点的批判和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群众性的”,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从“群众”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性等落后性中产生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把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行动在党提供给它的政策中所获得的认识作为最终的要求”。^{[6] (p86)}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理论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同“群众”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性等落后性特点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群众”作为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必然是历史的产物,这也就决定“群众”的思想绝不是一个“无前提的新起点”。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理论的虚假性、片面性,“客体的数量化”,“抽象的反思范畴”^{[7] (p75)} 和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物化都可能浸染和影响“群众的意识”,都可能构成对“群众”行为的规定。这一切都会成为“群众”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性等落后性特点的诱因。“落后性的障碍”会构成“群众”的“内在的障碍”。^{[7] (p74)} 因此,对于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来说,“自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乃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资产阶级却用抽象的反思范畴,如数量化、无限进展等来掩盖日常生活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结构,结果在发生突变时就面临着直接的灾难”。^{[7] (p74)} 这样,批判和斗争“群众”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性等落后性特点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理论工作者的目标选择。另外,对“群众的思想”的批判过程必然是提高“群众”的认识的过程。列宁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学说”^{[8] (p317)} 灌输给“群众”,才能逐渐克服了“群众”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性等落后性特点。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群众”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9] (p313)} “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7] (p68)} 而要得到这些认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必然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能够为“群众”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之所以能为群众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就在于它本身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群众的实践”提供合理的前行路标和方向。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新唯物主义基础上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批判了他们视阈中的社会现实,深刻总结了“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群众的解放”必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现实已经是一个“成熟”^{[10] (p724)} 的现实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新世界”正孕育着新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他们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必然是符合历史的、现实的,因而是合理的。二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所设计的理想图式本身就是开放的,它没有终结人类解放的一切程式和方案,“群众”在任何时空交汇点上所获得的解放都只是向终点的临近,而不是最后的到达。因此,前行的方向必然在“群众的实践”中永远前移。这种路标必然会合理地兼容人的形而上之本性和形而下之本能,必然会有机地融会人类的辩证法精神和形而上学精神,因而是可实践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实践中实现了多个“根本转型”和“伟大跨越”:首先,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从“被压迫者”向“主人”的根本转型,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中国社会从此告别“两半社会”的悲惨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且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国度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以巨大的勇气借鉴国际经验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此语境下,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层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建设取得巨大进步。总体上说,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能够解决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的理论,是能够实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理论。尽管现实中,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现象或问题存在,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它们是忽视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旧社会的旧观念影响的必然结果,是西方思想文化中的腐朽成分影响的必然结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是个伪命题,其理由就在于普通群众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根据某一时点上的实际情况来作判断,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超出某一个时点的界限,进入一个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民族化一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没有完结的过程,是一个永远在“在”中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它才会不断地去奔赴自己的目标,去履行自身的责任,去完成历史赋予它的神圣使命。只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间的有机关联性,才会得到充分体现。群众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取决于群众的需要,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务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务实性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已经得到大量群众实践的充分证明,是没有问题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同样证实了群众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中国革命”才会有“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才会有“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才会有“光明发展前景”。^{[11] (p3)}更何况,理论对群众需要的满足程度还取决于群众对理论的认识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理论的落实程度。

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相关性。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需不需要“批判”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需不需要“批判”?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有所指的。目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过程中,需要“贴近”但不强调“批判”。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讨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过程中,“贴近”是必然的,不贴近“群众的现实”,就不可能实现大众化。但是,仅有“贴近”,而没有“批判”,也不可能实现大众化的目标。在笔者看来,“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的必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是实现人的根本解放的必要中介。

首先,“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很早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 (p200)}因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对“此岸世界”进行批判。而“此岸世界”,在马克思那里,就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现实,就是“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13] (p53)}无产阶级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是靠自身的“饥饿痛苦”和“勤劳”支撑起“富人”“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的“工人阶层”,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现今社会的最下层”。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合理性、不公正性和不公平性。只有对这种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才能揭示“无产阶级”“存在的秘密”;只有对这种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批判,才能确立起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现实展开了一系列批判,这主要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劳动批判、社会关系批判、精神生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状况进行了批判,虽然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为先进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3] (p41)}但是,如果没有先进的理论去武装它们,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只能成为一种“潜在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还会有人违背自己的出身而变成“政治工贼”^{[13] (p11)}的可能。因此,需要不断对群众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

所有这些批判的过程及其结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期的主要内容和时代特征。没有这些批判,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认识;没有这些批判,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关于自身的存在境遇、发展趋势和历史使命的正确认识;没有这些批判,就不会有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没有这些批判,就不会有席卷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出场。因此,“批判现实”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的必要前提。

其次,“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批批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理论家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精神和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实际进行有机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在没有“榜样和先例可循”的前提下,在深刻批判俄国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对俄国无产阶级的“自发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正是有了这些批判作为理论前提,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俄国才开创了在落后国家率先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先河,“新经济政策”才作为一个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被深深镌刻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列宁主义就是在深刻“批判”的前提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过程。正是有了“批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才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才在中国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才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提供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是有了“批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才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才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才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才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正是有了“批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才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正是有了“批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是有了“批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以更大勇气深化改革,强调实干作风,提出“中国梦”构想,出台“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才在顶层设计中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新拓展。

再次,“批判”是实现人的根本解放的必要中介。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体现:其一,“批判”是根本变革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精神解放的必要中介。马克思指出:通过“批判”的根本转向来消解“彼岸世界的真理”并由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把作为“精神武器”的“哲学”同作为“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进行有效对接并通过这种对接来实现“头脑”和“心脏”的双重“解放”;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把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精神世界即他们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各种精神关系归还给他们自身。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指与作为个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想象、思维、精神交往”;作为民族或者国家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14] (p524)}因此,人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还必然表现为人同传统的精神活动状况及其结果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精神解放也就必然表现为人同传统的精神活动状况及其结果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其中,“批判”始终是一个必要的中介环节。其二,“批判”是根本变革人的物质世界实现人的物质解放的必要中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物质活动主要是指作为个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决裂还必然表现为人同传统的物质生产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人的物质解放也就主要表现为人同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变革人的物质世界实现人的物质解放的过程之中,同样需要“批判”的参与。因为,只有在“批判”中,才能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感受到同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把握物质解放的方向和未来。因此,“批判”必然是人实现物质解放的必要中介。其三,“批判”是根本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必要中介。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最终解放,政治解放只是一种阶段性解放。但是,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事务的深刻“批判”,“政治精神”^{[14] (p45)}就不可能“从分散状态中汇集起来”,就不可能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根本摆脱资本主义的政治桎梏和在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政治束缚。因此,“批判”必然是人实现政治解放的必要中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这种劳动造成了自然界同人相异化、类同人相异化、人

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和人同人自身相异化。^{[14] (p161-163)}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深刻“批判”,才认识到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本质,才了解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才知晓消灭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同实现劳动解放之间的必然关联。因此,“批判”必然是人实现劳动解放的必要中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是“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3] (p34)}要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就需要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根本实现这种解放的关键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来获得正确的相关性认识。因此,“批判”必然是人实现社会解放的必要中介。

那么,“批判”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批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是理性的分析,就是合理的宣传,就是科学的引导,就是耐心的解释,就是持之以恒地变革人的精神世界,就是理直气壮地抑恶扬善,就是理论有机地进入现实。“批判”必须义正词严、严谨务实、客观公正,绝不可遮遮掩掩、畏畏缩缩、搞调和主义。“批判”必须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绝不可得理不饶人,绝不可颐指气使,绝不可飞扬跋扈,绝不可盛气凌人,绝不可像“特定时期”那样搞人身攻击和对生命进行任意践踏或摧残。

当然,根本变革现实世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除了“批判”,还需要有变革现实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根本变革“现实世界”。这说明“批判”的效力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无限的,而且“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4] (p11)}甚至对“批判”效果的检验也不能仅仅从其自身中得到证明,还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获得实证依据。尽管如此,但这并不丝毫影响“批判”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的功用和价值,也不丝毫影响“批判”在当下社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有观点认为,当今形势下,“批判”的做法已经过时,不适合用来作为一种理论武器去变革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人的整个世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把“批判”仅仅理解为一种得理不饶人,或者颐指气使,或者飞扬跋扈,或者盛气凌人,或者像“特定时期”那样搞人身攻击和对生命进行任意践踏或摧残,那么,这种做法的确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应该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如果因噎废食,或者因为曾经存在过异化的“批判”或者“批判”的异化而看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价值和意义,并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有极大的可能导致认识发展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认识发展走向某个极端就有极大可能导致社会、国家和人的发展也朝着那种极端方向发展。如果这种可能性成为了一种现实性,那么,这样的现实性很可能就是一种好坏不分、善恶难辨、人不人、鬼不鬼的现实。这样现实必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劣币驱赶良币”的,这样的现实必然是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当下依然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对一切需要“批判”的东西进行深刻地“批判”,需要“批判”一切落后的东西、消极的东西、腐朽的东西、无所作为的东西、不合时宜的东西和妨碍社会进步的东西,需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构和弘扬真的东西、善的东西、美的东西和符合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东西,需要在“批判”、建构和弘扬的基础上去引导群众、武装群众。只有这样,时代的思想、认识 and 理论才能真正属于时代,才能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要求;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才不至于变成经院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不至于变成从众化,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才不至于变成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不至于变成民粹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至于变成纯粹的物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

三、理论工作者怎样才能履行好自身的历史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怎样才能履行好自身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具备求真务实的理论献身精神和积极批判的实践精神。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有所作为。

一方面,需要具备求真务实的理论献身精神。这是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功和必备项。它要求理论工作者要善于学习和掌握理论。要善于学习理论,就要积极走向书房、面向经典、面向书本。善于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善于在经典的旷野中探索,善于在书本的高山中攀登。

在当今这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理论工作者的所有知识不可能都从直接经验中获得。加之,任何一种知识或者理论,都存在着自身的理论谱系,又都构成某一特定理论谱系的一个环节。因此,走向书房,从书房中学习,向“冷板凳”学习,向间接经验学习,就是必须的。马克思潜入“大海”的例子已为世人所熟知。在知识储备期,马克思就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述,仅哲学一项,他就阅读过古希腊哲学、伊壁鸠鲁哲学、笛卡尔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费尔巴哈哲学,还有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的哲学著述。即使在后来,马克思也多次回到书房吸取理论营养。正如梅林所说“1853年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曾经回到自己的书房;同样,1873年,在国际的临终痉挛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了书房。”^{[15] (p638)} 马克思“坐冷板凳”的功夫同样为世人所熟悉,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在大英博物馆留下的“足迹”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走向书房,不是毫无选择地吸取知识。那么,学习什么样的东西,或者阅读什么样的书籍,才可以获得学习效益最大化呢?我国著名哲学家孙正聿教授对此总结得很经典:要读世上难读的书。作为理论经典的书越是难读,读了收获越大。它给人提供的思索空间更加广泛,它对人的思维的缜密性的训练更加严格,它对人的存在的影响更加深远。那么,哪些是难读的经典呢?这里以哲学为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肯定是。除此之外,还有笛卡尔的著述、康德的著述、黑格尔的著述、费希特的著述、胡塞尔的著述、海德格尔的著述、萨特的著述等等。其实,难与不难,并没有一定之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态度。如果你的确通过阅读掌握了它,那“难”就变成“不难”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具备一种敢攀高峰的勇气、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严谨治学的精神。通过理论学习储备在脑子里的知识不一定都是有效准的,还需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批判它们。只有那些经过分析和批判之后具有真值涵项的东西,才是有效准的。只有获得具有有效准的东西,才算初步掌握了某种理论。

另一方面,需要具备积极批判的实践精神。这是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功和必备项。它要求理论工作者在掌握一定理论的基础上善于把自身的理论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理论工作者掌握理论的目的在于运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 (p502)} 因此,理论或者理论工作者兼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使命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和要求。理论只有走向实际、走向群众、走向社会,才能“解释世界”;理论只有武装群众,才能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理论只有抓住了群众,才能武装群众;理论只有抓住了群众的根本,才能抓住群众。而群众的根本就是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诉求。因此,理论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过程就是把握群众之根本的过程,就是武装群众的过程,就是向群众“解释世界”并动员群众来根本“改变世界”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既是“化”的主体,也是“化”的客体。通过“化”来根本变革群众的“精神世界”,这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客体性;同时被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自觉变革“物质世界”,这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的过程中,应力求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尽量做到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为此,理论工作者务必:一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向群众学习语言,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群众明白易懂的语言;二要围绕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展开理论宣传和理论解释,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可信性;三要广泛运用各种传媒进行理论宣传,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引导舆论宣传,还要重视互联网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这样一来,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既要具备学术关怀,又要具备现实关切;既要具备理论深度,又要具备实践向度;既要确立好自身的本体论根基,又要确立好自身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基础。因此,在理论工作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细致的探索过程,是一个理性的爬梳过程,是一个求真务实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学者走向群众的实践过程,绝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过程,绝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绝不是一个“戏说”“恶搞”的过程。

因此,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以“通俗化”的名义反对一切概念主义和逻辑主义,另一种是以“概念化”的名义反对一切通俗主义。前一种倾向要求解构一切具有复杂概念形式和逻辑结构的理论,

并力图使它们满足“通俗易懂”的要求。后一种倾向要求用纯粹抽象的概念形式和玄奥的逻辑形式来书写和表述一切理论成果。两种倾向是两种极端。在当下,它们都有一定的市场。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同样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不仅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本身带来负面影响,而且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众所周知,理论本身有其自身的特质,理论的构成是由概念形式和逻辑形式作为其支撑的。没有概念形式和逻辑形式支撑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在思想谱系中,每一种能够作为经典存在的理论都存在于其特有的概念形式和逻辑形式中。在概念形式和逻辑形式中,前者突显的是特定的个人境遇、历史风格和时代特色;后者突显的是理论的历史谱系的共同逻辑。因此,概念形式和逻辑形式必然构成特定经典理论的必要中介。因此,“通俗化”并不等于非要将一切经典理论的概念和逻辑全部消除干净,也不等于非要用十分感性的方式或者“青春萌动”式的“冲动”去面对一切概念或者逻辑。“概念化”并不等于非要把群众喜闻乐见、简单直白和朴素易懂的东西搞成玄妙高深、佶屈聱牙和抽象晦涩的东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在面对特定的理论谱系或者思想史的时候,必须要拿出严谨、求真和尊重的态度和精神去研究、学习、分析和批判,这是没有商量的,也不可能没有商量;在面向人民群众时,要尽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理论、阐释问题和解释世界,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一切值得吸取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来检验、丰富和发展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善于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他们关切的实际问题和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只有这样,理论工作者才能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陈学明,马拥军.走进马克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M].杨大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7][匈]捷尔吉·卢卡奇.卢卡奇文选[M].李鹏程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8]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责任编辑:郭荣华)